

#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探析

杨海

**【内容提要】** 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了极为丰富的风险防范方法论，“总体性”方法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法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国家安全“体系”，秉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国际安全新理念，蕴含“六大科学思维方法”，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全面梳理、深入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方法论意蕴，既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又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方法论的引领，对于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全面促进国家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性方法论 风险防范

**作者简介：**杨海（1974-），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安全与制度反腐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2206）。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扬弃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以及“新安全观”（即国际外交观）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在其孕育发展中也吸纳了国外国家安全战略思想中的精髓，但这绝不是站在落后的历史阶梯上仰望西方，“而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sup>①</sup>，建构全面、系统、高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

## 一、问题的缘起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就要运用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大安全”理念。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总体性”方法论问题作出深刻分析，精辟阐释，引起学界广泛共鸣。

### 1. 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当今世界亦毫不例外，“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经济格局深刻演变，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文明优越论不时沉渣泛起。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相互激荡，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相互对峙，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互碰撞，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当前的中美贸易涉及的安全问题尤为棘手，牵扯到方方面面的法

<sup>①</sup>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律关系和国家间的其他各种关系。那么，WTO 争端解决机构是否适宜解决此类争端？这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

运用“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全面、准确把握和观照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性脉络，自觉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秉持的国际安全新理念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化解全球动荡源所引致的各类风险交叉感染所形成的结构性风险，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结合，在统揽全局中突出重点，有力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2. “压缩的现代化”形成“共时性”风险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性相互交织。这既为世界各国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带来诸多不可预料、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现代风险。这些风险盘根错节，相互渗透并撕裂人们长期以来所构筑的看似“固若金汤”、无懈可击的各类防范举措。

世界风险社会将当代中国置于一个“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语境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西方发达国家“历时性”风险在当代中国则以“共时性”风险登场。这种“共时性”风险以高度浓缩的方式把现代中国社会交织成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风险、早期工业社会的危机状态以及当今社会中现代弊病为一体的复杂形态。这种“共时性”风险如若一旦爆发，其来势将更为猛烈，表现更为集中，处置起来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方式方法。这些深层次矛盾、系统性风险正呼唤社会治理领域“总体性”方法论思想的“闪亮登场”。

## 3. 新时代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重要论断，它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人民的需要”基本面更广。“人民的需要”已经从过去单纯的“物质文化”领域拓展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具体而言，今天我们在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领域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需要的基础上，还要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需要。第二，“人民的需要”质量要求更高。在新时代，人民所享受到的需要有的是过去一直在享受的，但这些需要质量亟待提升，如更好的教育等。

“人民的需要”呈现出多样性、多变性、深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等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蕴含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一带有“总体性”方法论原则为引领，动态地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过程中因体制机制变迁和制度创新有可能带来的各式各样高度复杂化的、系统性风险与结构性矛盾，强调用人民安全这一安全宗旨来统筹一切国家安全工作，以克服传统国家安全观将国民安全边缘化、工具化这一错误倾向。

## 4. 当代中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内源性、和平式的崛起，超越了西方大国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而崛起的发展之道。“兼善天下”的中国崛起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造福中国人民，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其正向溢出效应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仍然遭遇诸多风险，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仍需经历较长时间，传统强国对中国经济“份额侵蚀”的抵制与恐慌感在急剧上升，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期待

过大”的压力与风险，中国社会价值体系和发展理念在短期内仍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国崛起后因挤占美国空间而招致的发展风险，崛起的中国将如何有效应对其他的一系列国际不适反应等。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以这个“集中统一”领导中所体现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为统领，“统分结合”“协调行动”“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统筹协调推进防范化解社会发展中可能产生的来自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相互交织而成的复合型风险。中国有能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意蕴

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意蕴就不应拘泥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内部的、带有局部意义的“总体性”要素，而应从整体上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局意义的“总体性”意蕴，这既是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方法，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性”这一本真精神的内在要求。

### 1.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凸显了“总体性”

“体系”一词在辞源的解释中就带有“总体性”意涵，“体系”一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今天，我们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体系”来分析，就是要全面梳理、深入提炼其中的“总体性”意涵，这对我们自觉贯彻、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从提出到构建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一，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初步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其二，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又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其三，《国家安全学》从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维度阐释了国家安全体系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意蕴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整体，其组成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

第二，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要求构建集政治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2016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再一次提出要构建国家安全体系；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并将此前的“构建”改为了“健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坚持与发展，在坚持与发展中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就蕴含了深厚的“总体性”意蕴。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个国家安全体系，其“总体性”体现在：在横向上，各安全要素相互贯通，高度关联。例如，单个的生态风险问题需要建立多边机制进行合作对话，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共同参与，协同作战才能解决。再如，治理我国当前面临的最复杂、最现实、最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的网络安全就要加强“网络综合治理，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网络治理合力”<sup>①</sup>。在纵向上，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包括传统安全要素，还包括非传统安全要素，从而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习近平指出：“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

<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3页。

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sup>①</sup> 其中的前面六种安全要素是传统安全要素，而后面的五种安全要素则是非传统安全要素，这五种非传统安全要素是基于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根据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而提出的，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的丰富与发展，在这种开放发展中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完备，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把国民安全（人民安全）与前面 11 种安全要素融为一体，构建集国民安全（人民安全）等 12 种安全要素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可持续性。新时代社会治理能否持久关注与回应人民持续增长的安全需求是检验我国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可持续性”的一块“试金石”。

## 2. 总体国家安全观秉持的国际安全新理念体现了“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安全的重要论述。他强调，“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sup>②</sup>。在这些重要论述中，共同安全作为一个核心词汇贯穿于国际安全整个理论的始末。他在亚洲安全观中又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国际安全新理念。很显然，这一国际安全新理念中的四种安全都从不同的侧面和维度阐释了“总体性”意蕴。在这四种安全中，起统领地位的仍是共同安全。

从表面上看，共同安全似乎只是一个标示着空间意义层面的概念，但它同时又是一种安全的状态和安全性质的表征，我们除了可以用共同安全这一范畴来统筹本国安全与外国安全问题之外，还可以用共同安全来描述事物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安全形势和发展状态的安全特征。因此，共同安全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中占据统领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具有典型的“总体性”特征。综合安全使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只强调传统安全要素，而忽视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缺陷性，综合安全的“总体性”体现在要统筹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合作安全揭示了谋求安全的动力源泉与发展路径的统一，强调通过对话实现“共赢”。实现“共赢”是合作安全的重要内核，这使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可持续安全的“总体性”体现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持续关注与观照人民群众对安全需求的新变化、新趋势、新特点，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在不同阶段的安全需求，这些不同阶段的安全需求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我们回应人民群众在不同阶段上表现的安全需求的举措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两种坚持与发展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

由于“新安全观”并不涉及对国内安全问题的观照，而国内安全问题又是国家安全中尤为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就能看出这一点，“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其主要内核，这“八个字”从根本上说就是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因此，“新安全观”并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外交意义上的“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sup>③</sup> 这一重要论述的启示是，与“新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以往“新安全观”只强调对外安全，国际安全，没有将内部安全纳入其中，没有重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性，存在局限性，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则克服了这种局限性，统筹兼顾了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并最终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01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0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01 页。

使其“总体性”这一重要特质凸显出来。

这些“总体性”方法论内涵，对我们践行国际安全新理念中的“总体性”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 3. 总体国家安全观蕴涵的“六大科学思维”体现了“总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蕴涵着丰富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六大科学思维方法”，这“六大科学思维方法”中的每个科学思维方法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总体性”意蕴。例如，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由此可见，战略思维能力的“总体性”体现在统揽全局上，把握总体趋势和方向上。历史思维能力的“总体性”体现为，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即历史思维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为一体的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的“总体性”体现在要全面、系统、普遍联系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更为深刻地阐述出所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意涵。与此同时，以上“六大科学思维方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在他们的高度关联中展现出“总体性”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了“五对关系”，是对辩证思维方式的具体表达，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思维，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从两方面来把握事物的辩证关系，是对现实安全问题的观照与统揽，这又体现了战略思维。这“五对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充分汲取国内外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在国家安全维护实践的长期的规律性探索中创造性地推进理论创新，这体现了创新思维与历史思维。因此，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以及历史思维都牢牢统一于这“五对关系”之中，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统一体，从而体现出“总体性”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二字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规律中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强调的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体现了底线思维。战略思维的鲜明特点是，要求我们要立足全局高度，用长远的眼光，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而底线思维则恰恰相反，它是要求我们从坏处准备，在行动上向好的方面去努力。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相互衔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统一于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全过程。因此，我们绝不能将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割裂开来，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两种科学思维方法的“整体”效应，努力使 $1+1>2$ 。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强调，任何个人和组织如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不履行该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就要对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展现出的最鲜明的科学思维方法就是法治思维。然而，法律作为公民的行为底线，法治思维同时也是底线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条指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sup>①</sup>这里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等论述又呈现出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因此，法治思维与底线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相互联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国家安全风险防范的实践。

### 4. 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了“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里的“统筹”和“集中统一领导”就体现了“总体性”意涵。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着力防

<sup>①</sup>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0页。

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性的体现，是大局，关系党、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各级党委（党组）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责任等。这里的“总体性”主要体现在：党的“绝对领导”，“统领和协调”，各级党委（党组）实现从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把国家安全工作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既体现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又在国家安全工作上实现了全党服从中央，从领导体制机制上实现了“总体性”方法论的创新。

2016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其“总体性”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对象是“全民”；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组织者是自上到下的统领性国家安全领导机关，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做实做好。

2014年1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这既是国家安全工作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实践要求的现实需要。尽管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以及“新安全观”等都有其相对应的实施主体和领导机构，但这些实施主体和领导机构在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中并没有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现得那么坚强有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中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这种统揽全局体现出来的“总体性”方法论特征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以及“新安全观”。

### 5.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体现了“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始终把人民安全置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其他安全要素之上，并强调国家安全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从而确立了人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首要地位、统领作用、价值旨归，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等都发挥着工具性作用并最终都服务于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理念中体现出来的“总体性”意蕴使其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政治安全为国家安全提供根本政治保证，而国家利益至上这一国家安全准则的目标是要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其最终落脚点都是要实现人民安全这个宗旨。尽管国民安全、人民安全并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首次提出的，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常常把政治安全摆在突出的地位，而国民安全却一度被“边缘化”，未将国民安全上升到宗旨性、目的性的高度加以强调和论述。

习近平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sup>①</sup>这一论述中的“既……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并列关系，而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这一哲学思维的深刻表达。这里的国土安全是包括国土在内的所有的“物”及“物的要素”的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折射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对待“物”与“人”的安全问题上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观重“物”轻“人”的局限性，在坚持重“物”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强调“人”的安全的优先性，在实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

现“人”与“物”的统一中把人民安全真正上升到国家安全工作的本原性、核心性、目的性的高度，使之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本真精神与核心要义。因为在这个“既……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用了一大段文字进一步着重强调人民安全的宗旨性地位。因此，这里的“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并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以人民安全为统领的“总体性”关系。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性”不仅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之中，还体现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关联的其他方面。例如，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安全工作应当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在国家安全实际工作中，也越来越突出用人民安全来统摄一切国家安全工作。一方面，我们要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理念贯彻到政治安全等各种传统安全领域，即政治安全的价值旨归最终是要确保人民主权与人民政权安全。传统国家安全观在把国民安全边缘化、工具化的过程中随即就把政治安全核心化、目的化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自觉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理念贯彻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治安体系建设，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重特大事故的遏制，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等，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理应成为实践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一重要价值理念的新的突破口。社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国家安全问题，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新安全观”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却都未提及，我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异”的新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这也是践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一“总体性”价值旨归的应有之义。

###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方法论启示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方法论具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与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充分利用发散思维，把好理论的学术接口，以问题为导向，让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方法论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 1. 着力破解风险涟漪效应，力图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国家安全体系，“体系”一词体现了“总体性”，破解风险涟漪效应需要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推进风险涟漪效应治理。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sup>①</sup>同时，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社会整体转型必然会引起体制机制创新与变迁，如若新旧制度体系衔接不力，必将出现各领域风险交叉感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总体性”方法论原则破解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改革风险涟漪效应，坚持“五个不让”，力图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防止各种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

从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层面来看，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组织结构关系亦变得日益发达，一方面，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如果基层政府不发挥这种缜密的结构性关系的正能量来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而是借这样复杂的组织结构关系象征性地服从，间接地对抗上级交办的任务，不但不能有效应对结构性风险，相反，还会进一步放大风险的涟

<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8页。

漪效应。面对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性发展,我们必须从整体上运用“总体性”方法攻克体制机制上的一些顽瘴痼疾,在由“分散”到“统一”的权力监督变革中形成整体合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并从制度漏洞的结构性困境中查明基层政府逃避责任的内在原因,防止奥尔森所谓的“制度硬化症”导致社会整个制度系统应变能力走向衰竭的现象发生。

## 2. 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总体国家安全观所秉持的国际安全新理念具有鲜明的“总体性”方法论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发展与安全并重”蕴含二者是统一的,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于:其一,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是同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犹如“孪生姊妹”,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在迎接风险挑战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前进道路的过程;其二,发展与安全不属于同一层级的问题,即安全风险问题是由发展引起的。发展蕴含着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多对矛盾统一关系,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力、优化发展结构的关键期,这种体制机制的转轨就不可避免地催化发展风险。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较为突出的安全风险问题,当前主要有:即逝公众和碎片化议题使网络空间讨论不可持续;“沉没的螺旋”和群体极化使得网络空间话语交往易于走向偏激;标签化舆论和理性的沉没造成了公众批判精神的失落等。于是,人们把风险这一概念自觉与不自觉地与反思性现代化勾连起来,风险“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sup>①</sup>。“发展与安全并重”这一重要方法论告诉我们,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发展和安全要协调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包括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里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实践活动是发展的,人的实践过程是在打破原有平衡格局又将取得一种“正向差异”的过程,在变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新风险。这就要求我们自觉运用马克思社会系统论、社会有机体思想中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观照差异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审视差异有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以求社会有序化运行,并最终实现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的转化,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有机统一,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坚持“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和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运筹好大国关系,同金砖国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巩固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框架。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合作共赢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 3. 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

如前所述,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了“六大科学思维方法”,其中,底线思维方法的“总体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它与其他各种思维方法辩证相处,相互照应,相互协调,共同作用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由此可知,底线思维包括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向度的问题:一个是“从坏处准备”,另一个则是“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有机结合中更好地牢牢把握主动权。这一辩证关系充分体现了底线

<sup>①</sup>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思维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特点。底线思维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深谋远虑的政治定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讲究策略和方法，牢牢守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动摇。

当前，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底线思维中蕴涵的“总体性”方法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的举措的耦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sup>①</sup>由此可知，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底线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全局意义的重大风险而言的。重大风险与一般风险相比较而存在，重大风险在表现形态上往往以综合风险、系统风险、结构风险、区域风险、国际风险等形式登场；其风险结构往往高度复杂，盘根错节，交叉感染，且具有极强的传导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底线思维中的“总体性”方法论为引领，积极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 4.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破解“改革悖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破解“改革悖论”，更好地贯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的“总体性”方法论思想。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破解诸多改革悖论，而破解改革悖论的基础是要通过修补“制度漏洞”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来实现。“制度漏洞”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都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风险源，如若处置不好，这两大风险源还会出现交叉感染，易于导致风险的放大。从根本上说，解决制度漏洞问题，亟须我们通过各种办法及时去弥补、修复各种制度建设上的欠缺，然而，制度的“惰性”与利益固化藩篱却易于滋生修补制度漏洞的反对者——改革悖论应运而生。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明确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发挥政治指针的作用，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下联动，有力有效破除改革悖论，把“制度漏洞”和利益固化的藩篱等重大风险源化解在源头——这也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实现“集中统一”领导所体现出来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2005年，国务院专门设置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旨在从战略高度、从总体上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统筹应急力量，统一调度救灾物资，组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等做法都充分体现了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在着力破解“改革悖论”中所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

当然，应急管理部门还要妥善处理好在防灾与救灾的辩证关系，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例如，机构改革后，有的省份实现森林“防”火与森林“扑”火的分离，森林的“防”火职能还保留在省林业局，但森林的“扑”火职能却已经划归省应急办了，这就需要这两个不同的部门加强深度沟通与协调，使“防”与“扑”的职能有效对接，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

#### 5.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贯彻其中的“总体性”方法论思想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共享发展为引领，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共享发展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三者之间辩证统一，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以“总体性”方法诠释了共享发展理念中蕴含的深厚的“人民情怀”。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更好地调动起全体人民

<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

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共享就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sup>①</sup>，坚持以共享发展为引领，就能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好地贯彻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理念。

从事实上看，社会风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如“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sup>②</sup>。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既有财富分配的正义问题，同时也存在风险分配的正义问题，这两种分配逻辑相互叠加更加剧了风险分配不正义的产生。在这种情境下，由于体制机制还存在一些障碍，社会弱势群体在风险分配中往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责任，再加上他们所占财富较少，掌握社会“资源”不多，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在风险来临之时他们识别风险的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就显得极为微弱。坚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就是要坚持以其中蕴含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为指引，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创美好新时代。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其中“总体性”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例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个‘全面’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sup>③</sup>。一方面，我们要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深刻领会其中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并以该方法论为引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结构性矛盾等发展难题；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汲取养分，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的创新性发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3] 《列宁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5] 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6]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7]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编辑：汪世锦）

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0页。